

2020年5月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,并对石窟寺保护利用作出重要指示。同年11月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工作。上百支调查队伍、近2000人参与了调查工作,全面摸清全国石窟寺保存现状。本版特刊发山西省石窟寺调查文章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文明之声

石窟寺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,集造像、壁画、建筑于一体,历史底蕴丰厚,文化内涵博大精深,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。为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、系统分析石窟寺保护形势,从去年底开始,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。

山西是我国石窟寺、摩崖石刻保存较多的省份,石窟寺类型丰富,分布于全省11市。石窟寺是山西地上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其中,既有开凿时间最早的云冈石窟,也有非常重要的天龙山石窟。我所在的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4家单位参加了此次山西石窟寺调查。

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工作,就不会乏味

“我们要抓紧啊,赶在下雪前把野外的活儿干完!”这是石窟寺调查队员田野调查时常说的一句话。尽管在过去紧张的4个多月时间里,我们如期完成了全部石窟寺的调查任务,但这个“催征的号角”依然在耳边回响。

从2020年11月中旬接到山西石窟寺调查任务到今年3月底完成石窟寺调查报告的编写与资料上传,时间非常紧迫。一些琐碎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很必要,如整理与石窟寺相关的文献、搜集各种地图、详细规划田野调查的方案等。

12月1日,我们迈出了走向田野的第一步。在开始阶段,我们对5处石窟寺进行了预调查,检验调查准备的资料是否满足需要、工具与车辆是否适用、人员组织是否合理、技术路线是否可行,并计算出每日的最大工作量。通过预调查,我们制定了简洁高效的调查方法,配备轻便易于工作的工具,规划了东中西3条路线。

这3条路线实际上与我们过去一直关注的晋阳到郟城的“并郟道”相关。这是东魏北齐时期沟通晋阳(今山西省太原市)与郟城(今河北省临漳县)之间重要的通道,“高氏集团”利用这个通道,将晋阳与郟城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我们想,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工作,就不会乏味。野外调查并不能漫无边际,也不能按图索骥,只能围绕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开展。每一处石窟寺调查结束后,我们不仅分析周边的寺庙与环境,也要向当地的乡亲们,力求有更多的新发现。

实践证明,这样的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成果。调查中,我们新发现了38处石窟寺,占整个山西省石窟寺新发现总数的70%。新发现的石窟中北朝石窟就有16处,规模较大的燕龛石窟现存有9个窟龛(风化较为严重)。有些石窟有明确的题记,如千佛造像、大佛头石窟等。这些新发现,不仅丰富了山西石窟寺的类型,也明确了石窟寺断代研究参考的标准。

脚下是碎石陡坡,眼前是文化长卷

此次调查中,多数石窟寺深藏山中,困难程度很相似。负责东线的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硕士

杨晓芳。考古专业出身的她第一次亲历石窟寺田野调查,与有石窟寺调查丰富经验的山西大学王炜老师组成团队,协作完成任务。

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是连接晋冀两省的重要交通线,运煤车川流不息,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十分危险。孟县十八盘摩崖造像开凿于公路上方、盘关峡口北山腰间,山势险要,调查工作难度很大,团队前后去了3次才完成调查任务。第一次去时,找不到当地村民带路,只好根据地图点定位,来到了造像所在山崖下方的公路。公路护坡极高,必须爬梯子上去,山上碎石较多,不断有石块滑落,出于安全考虑,未能继续爬山。第二次去时,团队在村民指引下爬山,但由于刚下过雪,草木残雪掩路,茫茫

山西石窟寺——

远在深山有人识

韩炳华

一片,辨不清方向,加之缺乏户外经验,考虑到安全,遗憾返回。第三次去时,由王炜老师先用无人机探查地形,最后决定他先从右侧上山探路,寻找到相对好走的路。即便是好走,脚下也是碎石陡坡,走走滑滑,异常艰难,好在有惊无险。待爬到目的地时,回望来路,大伙儿异口同声笑着说:“这可怎么下去呢?”

“这次调查是全面、系统地了解山西石窟寺的宝贵机会。”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袁琦,尽管主修文物建筑,但对石窟寺非常感兴趣。在她看来,石窟寺调查和建筑调查一样,要做到真实全面的记录。她的任务是中线调查,从榆次、昔阳到和顺再到榆社、左权,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60余处石窟寺的调查任务。在调查昔阳夫子岩石窟时,没有路,队员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穿冰河、爬石子山、钻荆棘丛,克服恐高,费尽周折,到达石窟时已经下午4点多。离太阳落山仅有1个小时,队员们明确分工,测量、绘图、拍照有条不紊地进行,跪在地上、借着躺倒的石碑绘图,抓住崖边的灌木照相。工作完成时,暮色已降,大家不顾危险,匆匆滑下山坡,衣服裤子磨出了洞,手臂也划出了血……进行和顺当城摩崖造像调查时,

室外温度达到零下23摄氏度,造像又处在风口,无人机因风速太大且低温而无法起飞。风



版式设计:赵德汝

近10年来,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有了持续提升,“活”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

6月12日是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。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的主题确定为“人民的非遗,人民共享”,突出了非遗保护惠及大众这一特性。

今年也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颁布实施10周年。10年来,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有了持续提升。“十三五”期间新增地方性保护条例37部,非遗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;建立了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,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,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。截至目前,我国共有4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名册,居世界第一。整个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、保护和传承意识有了质的提升。

这些成绩来之不易。“活”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,铺展开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:“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,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”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、增强科技赋能,把来自于人民、传承于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弘扬好,持续推动其融入现代生活、体现当代价值,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。

比如,在长江、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,将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串珠成线,推出相关主题旅游线路,建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景区景点,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,让传统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和杂技、传统手工艺等融入沿线居民的生活,成为游客的向往。

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,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有可为。面对“千村一面”、旅游产品“天下一家”等问题,通过挖掘和振兴乡村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,一方面能够成为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,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,可谓一举多得。数据显示,10年来,中央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从2011年的4.14亿元,增长到2021年的8.08亿元,累计达到77.66亿元。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地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就业工坊超过2000所,带动项目超过2200个,带动近50万人就业,助力20多万贫困户实现脱贫。“活”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积极力量。边远偏僻地区往往是传统工艺项目的富集区,让贫困户从剪纸、刺绣、绘画、食品加工等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得收入、增强自信,成为很多人的共识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、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。之前,传承人的设计能力和审美能力有待提升、版权意识弱等问题困扰着不少传承人。怎么办?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培计划启动,传承人纷纷走进高校,学习专业知识,研究传统技艺,开展交流研讨。经过强基础、拓眼界、增学养,传承人创作了大量原真性、实用性、审美性俱佳的作品和产品,其中不少成为“网红”“爆款”,备受年轻人青睐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水平持续提升,表现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,更多“90后”“00后”加入传承行列。

中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际社会点赞为中国人的“绝活儿”。从传统音乐、传统舞蹈、传统戏剧、传统杂技到书法、木雕、瓷器、刺绣等,其精彩的展示、精湛的技艺、精美的产品,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“中国走向世界,世界了解中国”的重要窗口,成为“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”的重要载体。

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世人瞩目,期待它彰显出更加深沉的文化魅力。

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人瞩目

郑海鹰

考古札记

从三星堆的铜尊说开去

方辉

持续数月的三星堆遗址发掘随着近日的系列“上新”“爆料”再次刷屏。除了以往所熟悉的金面具、牙璋、象牙之外,3号祭祀坑完整出土的一件名为“铜顶尊跪坐人像”的青铜器引起热议。

铜尊是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的礼仪重器。尊,《说文解字》说“酒器也,从西,升以奉之。”像双手奉持酒器之形。我国最早的铜尊发现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,属于商代前期。与三星堆一样,郑州商城有一件铜尊也出土于祭祀坑内,反映了商代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一样,都有以铜尊作为礼器或祭器的传统。而二者的铜尊在形制、纹饰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,甚至都兼具圆尊、方尊两种形制。郑州商城铜尊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,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段。

3号祭祀坑的这件器物高115厘米,体量庞大。与此相似的青铜顶尊人像在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2号祭祀坑曾有发现,但体量很小,而这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写实性更强,学者们认为它再现了古蜀文明祭祀盛况。显然,应

该是三星堆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器物。其特征一是数量多,1、2号祭祀坑共出土铜尊13件,加上成都附近的彭县(现为彭州市)竹瓦街早年也出土过这种尊形器物,与三星堆其他种类青铜器器类相比,形成压倒性多数;二是器物体量大,1、2号坑出土铜尊一般高度都在40厘米以上,最大者可达70厘米,新发现祭祀坑出土铜尊的尺寸还不清楚,但从新闻媒体发布的多件方尊等图像来看还有体量更大者,而商文明目前所见铜尊鲜有超过40厘米者;三是具有写实性,以两件“顶尊跪坐人像”为代表,辅之以身躯硕大的青铜立人像、边缘上“山川祭祀”图像等带有明显的礼仪性活动的写实场景,让3000年之后的我们在“阅读”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兴奋。考古学家常说考古研究要“透物见人”,三星堆的这些器物直接让你既见物又见人!这些感受是我们在“阅读”三代文明青铜器中不容易获得的。

说起尊,自然会想到鼎。尊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地位虽然重要,但不能取代鼎的地位。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鼎属于二里头

文化四期,年代上大约相当于夏商之际,比文献传说的夏禹铸铜鼎晚了一个阶段,但“尚鼎”“尊鼎”的文化传统却植根于更早的龙山时代乃至更早。三代礼器系统中的鼎鬲爵、鼎簋组合中,鼎总是第一位的。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似乎还没有发现铜鼎的踪影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这或许说明,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途径相同,古蜀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是兼容并蓄,并以其独有的人像、神树和象牙等文化因素为基础,在大约相当于商代时期形成了其独特的区域文明。此后的古蜀文明经由金沙文明发展为巴蜀文明,并最终成为秦汉帝国的组成部分。

三星堆考古意义是多方面的,其精细化发掘方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所体现的科技含量,无疑代表了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新模式。接下来,学术界将围绕器物所体现的技术、社会和信仰等展开多层次的解读与阐释,共同解开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发展的密码。(作者单位: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)



图为三星堆3号祭祀坑中的铜顶尊跪坐人像。王明峰供图

